

华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民国时尚与服饰制度--以女子服饰为中心的考察（1912-1929）

姓名：原海晓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姜进

201105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女子流行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民国服饰制度、五四运动与民国女子服饰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于民初的服饰制度只规定了礼服而对民间常服不加限制，时尚^①首次在中华大地上具有了合法性。从等级服饰制度中解脱出来的女子尽情的宣泄自己的审美情趣，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女子服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五四运动时期简洁朴素又具现代特色的“文明新装”是当时广受欢迎的服饰，五四运动以来在自由、平等、男女平权思想刺激下女子长袍、长衫开始兴起，初兴的女子旗袍严冷方正，正是对男子长袍的刻意模仿。此外，近代旗袍的演进还受到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总之，民国女子对男女平权、自由、民主观念的最朴素理解可以从民国近 20 年来女服的变迁以及旗袍的演进中得到体现。

五四时期是一个既讲民族主义又向西方学习，既要与世界大同又反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时代。五四运动时期不是传统服饰被西化，就是西方服饰被民族化，中山装与旗袍也经历了一个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过程。后来，这种既保留了民族传统又有现代服饰特征的中山装、旗袍被南京国民政府纳入服饰制度。

关键词：服饰制度，女子流行服饰，五四运动，旗袍

^① 不同人对时尚有不同的定义，作者认为时尚即时下的流行风尚，文中特指民国的流行服饰。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my thesis is about the women's fashion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I t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clothing regulation, the May Forth Movement and the women's fashion. The regulation reflects the ruling class's will, while fashion can reflect the will of the folks. The thesis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nd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m.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j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l dress of the clothing regulation and it doesn't refer to the informal dress, so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Chinese to be fashion. After the liberation from clothing regulation, women want to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and express their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y changing clothes as they want. Simplicity costume of students is very popular at the period of May Forth movement. At that time the robe of women begin to appear and it represents a sense of equal rights. At the very beginning, Qipao is a deliberated imitation of man's long gown. In addition, the evolution of Qipao is deep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aesthetic. In a word, we can find women's basic understandings of equal rights and democracy both from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costume and the amelioration of Qipao.

There are different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Forth Movement, both nationalism and westernism coexists, both cosmopolitanism and anti-imperialism combines. It is also a period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being westernized and also the western dress being nationalization. Both Qipao and Zhongshan suit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se two kinds of costumes which keep the dress features of both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modernization were being bought into the clothing regulation of Nanjing government.

KEY WORD: the clothing regulations, the popularization of women's costume, the May Forth Movement, the Qipao

原海晓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 名	职 称	单 位	备 注
刘 昶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主席 主持人
李世众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杨奎松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许纪霖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韩 钢	教 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绪论

一、研究缘起

穿衣服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稀松平常但意义极大，服装打扮不仅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购买力和个性特征；而且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社会文化等都密切相关。现在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大卖场、专卖店、购物中心选购衣服，据调查显示，解放前只有18%的上海居民的衣服是购买的，^①民国时期人们的衣服也大都是自己做或者请裁缝做的。当时人们对自己的服饰很有主张：在毛织品需要大量进口的民国初年，做衣服的布料选择丝、绸、棉、毛类国货，就是在支持民族经济；一些对西方文明与进步向往、意欲革新的人们则放弃传统袍褂而改穿西服；“民国初兴的旗袍就是按照男子长袍裁剪的，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而是因为当时女子，初受西方文化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蓄意要模仿男子排斥女性化的一切”。^②

社会生活与政治都与衣服底改变有密切的关系。男子的服装大体说来不如女子底变底那么快。中国底女装在近二十年来变得更快，这是指示近年来女子底生活的变动。她从幽闭的绣房跳出来演电影、作手艺、做买卖、当教员、乃至做官吏、当舞女，在服装上自然不能改变。关于衣服变迁的研究，是社会学家，历史家，美术家，家政学家，应当努力底。^③

研究民国服饰的学者很多，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对民国女子服饰的流行过程做了很好的梳理，^④但是很少有人把民国的时尚盛况与当时服饰制度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规定人们穿着的制度被称为服饰制度，民国时期的服饰

^①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328.18%的购买衣服者包括从裁缝店或成衣店购买。而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研究认为解放前人们的衣服大约1/4是裁缝做的，1/5是成衣店买的。转引自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5.

^② 张爱玲：《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第73页。

^③ 许地山：《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大公报》1935年5月11日。

^④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黄能馥著：《中国服饰通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华梅：《中国服饰》，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版；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制度只规定了礼服，对民间常服不加限制。因此，时尚^①首次在中华大地上具有了合法性。从等级服饰制度中解脱出来的女子尽情的宣泄自己的审美情趣，并以此来表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女子服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时装女王夏奈尔有句名言“时尚流向街头，但我否认它来自街头”，促成时尚的原因有很多，民国时期的服饰制度就为百花齐放的时尚界提供了法律保障。民国时尚流向街头，但是它不仅来自街头，更因为其背后的制度支撑，此时的时尚与服制从来都不是分离的。

最初的服制是用来区分上下等级尊卑以及维护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统治的。而民国时期的服制则是为了与满清划清界限，向西方学习、与世界大同。没有北洋政府 1912 年制定的趋向西化、民主化的服制^②不可能出现民国初年女子服饰的繁盛景象；没有五四运动以来女子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以及对西方审美的认同，旗袍不会自动贴上男女平权与现代化的标签，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凭空将缘于满族袍服的旗袍纳入服制^③，旗袍被定为国服后又促使它进一步的普及和流行。

关于旗袍的研究很多，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一般而言，大都从旗袍本身的形制包括裁剪、样式、材质、纹样、审美、工艺特征等方面来研究，缺乏服饰与人物和社会背景的联系。很少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研究旗袍的历史变迁及其推动力，本文试图把旗袍的演进与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服饰制度的制定联系起来，捕捉这一初为少数民族的服饰最后被纳入民国服制、定为国服、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背后动因。

二、学术史回顾

国内研究现状：

1、有关服饰的通史性著作：

许多关于服饰的通史性著作都涉及到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演变过程，图文并茂的再现了当时服饰的整个流变过程，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

^① 不同人对时尚有不同的定义，作者认为时尚即时下的流行风尚，文中特指民国的流行服饰。

^② 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 1912 年 10 月 3 日，向全国公布参议院最终决议通过《民国服制》。

^③ 南京国民政府 1929 年 4 月 16 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将正在流行的旗袍列为女子礼服，大约同时教育部公布学生制服，规定女生长衫为校服。

饰史》《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服饰通史》以及华梅《中国服饰》《服饰与中国文化》等。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讲到“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①研究了上至商周下至明清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其学术价值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此书重在历史考证，是对中国服饰源流及其演变的梳理，比较不注重对服饰演变的分析，也不会讨论服饰制度的问题。

周锡保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记叙了中国自古以来至明清服饰的变迁，每章以文献和图例分述男女官定服饰和日常服饰以及礼仪习俗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中提出，旗袍“在民初汉族妇女着著者还不多，到二十年代中期才逐渐流行起来；以后就渐为一种普遍的服饰；到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已不论老小都改着这种旗袍，逐渐取代上衣下裙的形式。”^②这一结论多为学界引用并认同。

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饰史》《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是被中国服饰文化学界公认的两部高水平的专著。两部书比较相近，都是从中国服饰文化的起源开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概述了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较为客观地介绍了不同时代的服饰制度，描写了不同时期服饰的特点、不同身份人们的穿着方法、服饰材料、服饰纹样和样式等。但对于民国时期服饰的文化内涵及其变迁的描述，两部书的篇幅都有限，内容过于简略，主要是对民国时期规定的礼服—中山装、旗袍、长袍马褂(及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干部服、列宁服等)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华梅教授被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服装文化学科的开创型人物之一，她著的《中国服饰》一书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记录服饰发展的历史。在古代神话、史书、诗词、小说以及戏曲中，与服饰有关的记载也随处可见。伴随着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服饰的样式和穿着习俗不断演变，历代服饰不仅朝代之间有明显的差别，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也有显著的变化。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 恤衫……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此书只是一个服饰史的回顾，提及的女子服饰也都是简单带过没有做深入讨论。

^①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4页。

^②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535页。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是华梅的代表著作之一，她认为民国时期女子服饰变化很大，主要出现在各式袄裙与不断改进之中的旗袍上。如袄裙，民国初年，由于留日学生甚多，致使中国人服装样式受到很大影响，其中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年轻女学生和思想进步女士穿袄裙时不施花纹，不戴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以区别于20年代以前的清代服饰而被称为“文明新装”。20年代末，因受到西方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人们又开始趋于华丽服饰，并出现所谓的“奇装异服”。满族女子之袍服在清末仍为体宽大、腰平直、衣长至足，加诸多镶滚。20年代初普及到满汉两族女子，袖口窄小，边缘渐窄。20年代末由于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明显缩短长度，收紧腰身，至此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改良旗袍。这样一个对女子服饰演变过程的简洁、完整的叙述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脉络，在前人基础上做更深层的研究工作。

2、关于旗袍的专著主要有：

研究旗袍的著作很多如：白云《中国老旗袍》；包铭新《中国旗袍》；袁杰英《中国旗袍》；郑嵘、张浩《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于君《女性与旗袍》；于金兰《中华旗袍》；李霞芳《时尚与典雅旗袍》；谭依山《中华旗袍》；江南，谈雅丽编著《符号中国，旗袍》；唐光艳著《旗袍》等。

江南，谈雅丽编著《符号中国，旗袍》，书中叙述了旗袍的发展演变、样式变迁、制作工艺、搭配等内容。

唐光艳著，《旗袍》，作者唐光艳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服系跟随台湾旗袍大师杨成贵学习传承手工旗袍制作技艺。书中主要教授旗袍搭配秘诀，旗袍穿着礼仪细节等。

只有包铭新和袁杰英的著作着重于综合分析旗袍的渊源及其变迁，其他的书目都主要在介绍和分析旗袍的传统工艺结构及制作量裁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将旗袍与当时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进行研究的寥寥无几，更没有人对旗袍如何从满族服装变为民国国服这一问题做很好的回答和深入的研究。

3、有关民国女子服饰的学术专著：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此书对1911年至1935年中国妇女服饰做了一个描述，作者的很多观点都对我很有启发。作者所说的妇女服饰包括：衣服、发型、鞋子、身体等，提出服饰与政治、地域、性别、阶级的关系，社会革命从服饰开始、服饰革命从妇女开始、妇女服饰革命从放脚开始；中国衣

着文化随着气候、民俗、区域特征而有所分异；妇女服饰在辛亥革命在社会阶级上有了突破，此外妇女把持渐多的职业岗位，更增加了女性服饰的变化。作者从总体上对民国时期妇女服饰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但是作者没有从服制与服饰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民国女子服饰的变迁。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澳大利亚学者 Antonia Finnance 教授研究了中华民国成立至今中国服饰的变迁，《中国服饰的变迁：时尚、历史、民族国家》这本英文著作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珍贵的图片，此外安东篱教授从政治的角度对中国服饰的变迁很多独到的分析，她指出了民国时尚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有复杂的关系。

英国学者 Joan Nunn 的著作《服饰时尚史》研究了 1200-1980 年欧洲服饰的流变情况及其历史动因，其中作者对 1900-1939 年欧洲服饰的研究成果与本文的研究时代相符合，通过这一时段内中西服饰的比较，开阔了笔者的视野。

英国学者 Mina Roces 和 Louise Edwards 主编的《亚洲与美洲的服饰政治》该书是一个论文集，收集了研究了亚洲与美洲十多个国家不同时期服饰与政治关系的 13 篇文章。

从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没有国外的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女子服饰的著作，也没有人从服饰制度的角度研究民国时尚，但是，这些书为本人了解民国时期妇女服饰提供了很多珍贵图片资料，此外，她们跨国界的宏大叙事方式开阔了本人的视野。

总体上看，几乎所有关于服饰的通史性著作都把民国女子服饰放在整个中华服饰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中，研究女子服饰的流变过程。也有学者研究各种女服的形制、特色、材料的，但是对于民国女子服饰流行的背后动因大多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展开。而且研究内容雷同者不少，大多只见物不见人，缺乏服饰与人物的联系，此外很少有人从政治的角度研究民国时尚，关于民国时期服饰制度与流行服饰的相关研究也很少。

三、研究方法和理论来源

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成为女性主义的著名口号，可以看出波伏娃对女性的生物构成与社会文化构成的区别是有所洞悉的，她不认为两性之间

的所有差异均是天生的，也就是反对“生理决定论”；其次，她对原有的以男性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持批判的态度，形成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本人认为民国服饰制度是国家制定的，体现的是由男性精英主导的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民国时期的流行风尚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罗大众的意志，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批判关系。

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①，对欧美妇女史研究的巨大影响。该文章问世后，促使此后的研究从对妇女的思考开始脱离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②学者们不再将20世纪前的中国描绘成一个对妇女的压迫一成不变的时期，开始探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主体性。本人在研究民国时尚时，关注女性在女子服饰流行与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探索与实践，以及她们对人格独立、自由的追求又如何通国流行时尚得到体现。

四 主要史料及其使用方法

论文主要依靠的资料有：报纸、杂志、档案、诸多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目以及图片资料等。

《申报》是该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通过《申报》中的新闻来稿可以对政府制定服饰制度的初衷及其制定服制的整个过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而且《申报》有许多自由撰稿人，他们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对当时的服饰制度与流行服饰有各种的看法和见解。此外《申报》的大量插图、漫画和广告为文章提供了很多重要线索，视觉资料补充了文字资料的不足，有时候又能与文字资料形成互证。在翻阅《申报》的同时也参考了《大公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

《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收集了尽二十种女性期刊，论文参考了《女子月刊》、《妇女杂志》、《女子世界》等，其中有许多关于妇女日常生活、妇女服饰以及妇女运动的集中讨论，为作者了解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和时代风貌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

^① 琼·W·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见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② 【美】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沪）2008年12期。

民国的《政府公报》中详细的提到了民国时期政府颁布的每一项法令，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饰制度在《政府公报》中都有原文摘录。并且可以和《民国史料长编》中的相关记载形成互证。

此外，本文引用了大量图片资料，包括漫画、图像以及照片。图片资料有时候比文字资料更能带给我们对历史的想象，而且有些图片补充了文字史料没有涉及到的地方，这些图片有力的支撑了我的论点。

第一章 服制初变

第一节 民初服制及其特征

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提出“断发易服改元，以与民更始”^①；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更加激进的革命党人提出，“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②；清末进步人士要求变革服饰的原因在于，“学习西方、世界化、实用化、现代化、强国强种等”^③；民国建立后，新政府希望首先通过变革服饰，来达到与满清政府划清界限、向世界看齐的目的。正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以示革新之象。”^④

虽然有了改革之意，但服制的出台，需要一个酝酿的过程。新旧交替之际，在新服制尚未明确之时，上至领导层，下至一般社会大众，都对如何着装产生了困惑。1912年，商务总长上沪军部都督书，请求政府早日颁发服制。^⑤因为在中央政府担任行政职务者与外宾交接时，穿便服觉得不庄重，而政府还没有颁发相关服制。此外他还主张，接待外宾时的冠服应选用西服以表大同；如遇庆贺典礼或不晋接外宾时所穿的服饰亦须加以规定；至于平时服饰则悉随其变以保全国货。希望沪军部都督谒见总统时力为陈请，核准颁行以崇礼制而定人心。^⑥实际上，服制不仅涉及到外交礼仪，更关乎一般大众的日常生活，由于人们对于礼服无所适从的状态，一时出现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例如，有一户人家结婚时所穿服装非常奇怪，“新郎身穿短褂而头戴古之员外巾，新妇则日本装加红裙，翁姑着八卦袍首戴纶巾”。^⑦

可见民国初建，服制问题亟待解决。由皇朝臣民转变为共和国民的人们，怀着各式的心情，畅想着新制度下的新气象。一方面，他们期待着新服制的出台；另一方面，也忧虑着新的服饰制度对国家经济、社会安定、个人现实生活等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当时，与服饰相关的讨论非常多，上至国家经济

^①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资料II》，第263-264页。

^② 《论发辫原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1卷下册，第748页。

^③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④ 《服饰刍议》，《申报》1912年1月7日。

^⑤ 《请定冠服制度》，《申报》1912年1月19日。

^⑥ 《请定冠服制度》，《申报》1912年1月19日。

^⑦ 《怪服》，《申报》1912年1月31日。

问题、社会安定问题、小到个人卫生无所不包。

自古帝王异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大汉光复发辫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国人深于习惯本其旧见，……若一旦修改西装，与中国大局亦有大不宜之现象也，兹揭述之如下：一关于国家之利权；二关于社会之损害；三关于个人之经济及卫生……故为目前计不如暂仍旧制，虽系满清之服，就各方之利害而审察之亦不无一长可取也，且吾尝征之于一般之舆论而亦皆云然矣。^①

新制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了，民初制服是由北洋政府参照西方服制制定的。尽管“西化”是新服制的一个主要特色，但制定者们仍然考虑了中国人的着装习惯，保留了一些传统服饰的特点。参议院用近两个月的时间经过初读会、二读会、三读会，对大总统提交的草拟服制草案逐条进行讨论，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补，最后，由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3日颁布发行。^②《申报》专栏“参议院纪要（本馆北京参议院特别通信）”，在1912年7至8月间，持续报道了参议院开会时众议员讨论制定服饰制度的整个过程。^③而从以下的这段报道中，则可以看出新服制诞生之初，“新旧并举”的特点：

民国新建亟应规定制服，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然使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日本维新以来，和服至今犹与洋服并用，而女子则用洋服者更少，今民国新定礼服，若概为更易，匪惟滋扰亦且糜费，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袍褂亦得暂行适用，女子礼服则更无多变更，军人警察外交官各应有特别制服，其它官厅制服，不必尽同，均可由各官厅自行制定。至便服暂听人民自由不加限制。^④

从数次会议讨论情况来看，争论的中心问题包括：服制的西化问题；满清服饰是否继续保留的问题；服饰的颜色问题；服饰的面料以及漏卮问题；也稍加谈及了女子服饰问题；以及服饰制度中丧服条例的取舍问题。总的来说，服制中的男子礼服基本上采用西式；服饰颜色不再作为区别等级尊卑的依据；礼

^① 《服饰台议》，《申报》1912年1月7日。

^② 服制制定过程也可参看《政府公报》，1912年9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76、680页。

^③ 服饰制度制定过程在1912年7月15日-1912年8月30日的《申报》新闻来稿中都有涉及到相关信息。

^④ 《民国服制之初读会》，《申报》1912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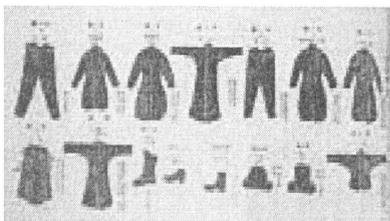
服面料要用国货以减少漏卮问题；至于女子服饰则继续沿袭旧式的“上衣下裳”，不需要与世界大同。民国女子服饰不采用西式，不与男子西服保持一致，这种做法跟明清之际男剃发、女缠足一脉相承，女子作为文化传统的承担者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下面，让我们具体看一下，北洋时期的服制所呈现出来的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倡导与世界大同、向西方看齐，但传统服饰亦得保留。

民国新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主要是西式的，男子礼服基本上以西式服装为主，男子大礼服、常礼服（甲种）皆为西式，十分类似于西方的燕尾服。鞋为西式高底皮鞋，帽子也完全为西式礼帽。但是多参照西式礼服似乎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民初男子服饰仍以长衫、马褂最为普遍，并更为讲究量体裁衣”^①，服制中是否要保留长袍、马褂和女子“上衣下裳”的传统服饰，被参议院议员反复讨论，因为它关系到民国服饰要全盘西化还是要保留民族特色。^②讨论过程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各执一词。^③最后，决议旧式长袍、对襟马褂为常礼服的一种，以适应社会习惯。但是民国时期流行的马褂、马甲，其样式与清代已有很大不同，均为立领、对襟、五粒扣。^④

北洋政府的服制中规定“女子礼服无多变更”。她们不需要与世界大同跟世界接轨，不用改装西服，所以保留旧式的“上衣下裳”就可。也有人提议，女子礼服应分为两种：一中式一西式；但赞成者少数，表决时仍采用旧式裙褂，并周身得用绣饰。^⑤对此结果有人表示不满，认为“议员诸公之取世界大同主义者，何以对男女新旧轩轻若此”？^⑥但是对此项质疑，各参议员基本上没有做出回应，女子礼服就沿袭前清汉族女子“上衣下裳”的样式。民国初年北洋政府

服饰制度中规定：



服制条例^⑦：

第一章：男子礼服。

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

^① 谢金铃：《清末民初北京服饰的变化研究》，2007年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史专题研究会议论文，第206页。

^② 《民国服制之初读会》，《申报》1912年7月15日。

^③ 《参议院纪要（本馆参议院特派员通信）》，《申报》1912年8月16日。

^④ 胡铭、秦青主编：《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70页。

^⑤ 《参议院纪要（本馆参议院特派员通信）》，《申报》1912年8月21日。

^⑥ 《参议院纪要（本馆参议院特派员通信）》，《申报》1912年8月21日。

^⑦ 《礼制服章》，《中华民国法令大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增补再版，第1-2页。

二种。^①

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

第三条：常礼服分二种。

一、甲种式如第二图，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或麻织品，色用黑。

二、乙种褂袍式如第三图。

第二章：女子礼服。

第九条：女子礼服式如第八图，周身得加绣饰。

第十条：凡遇丧礼应服前条礼服时，于胸际缀以黑纱结。^②

其二，服色限制弱化、丧服条例简化，服饰等级制服基本上被废除。

在中国历史上，服饰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显示人的身份地位，服装颜色则是标识要素之一。服饰的色彩是礼制的一部分，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贵贱、官职高低的重要因素。^③清代就规定官吏、平民不得用黄、紫两色的衣服。民国制定服制时服饰色彩的重要性大不如前^④，北洋政府已经淡化了服饰颜色作为统治手段、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功能，^⑤所有的男子礼服、礼帽、礼靴皆用黑色^⑥，而参议院议员在对女子服饰颜色进行讨论时，参考的是女子服饰时下最流行的颜色。^⑦此时，服饰颜色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同帝制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服饰颜色不再能区分等级上下。

在帝制中国，丧服制度是依据亲属亲疏关系制定的一种服饰等级制度。民国初年的服制中，有关丧服方面的内容被简化，以丧服区分等级秩序的功能也被废除。北洋政府制定服制时把以往繁复的“五服制度”^⑧简化为男子“凡遇丧礼，着礼服，于左腕围以黑纱”，而女子“凡遇丧礼时前礼服，于胸际缀以黑纱

^① 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二种，昼用大礼服为西式大氅式，晚用大礼服似燕尾服而后摆呈圆形，裤用西式长裤。常礼服二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均黑色，料用本国丝，毛织品或棉、麻织品。参见《政府公报》，1912年10月4日（第157号）。

^② 《礼制服章》，《中华民国法令大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增补再版，第1-2页。

^③ 相关研究颇为丰富：杉本正年，樊一，《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王安安，《古代服饰制度中服色的文化内涵》，《文博》2003年第3期；钟雅琼，《中国古代服饰颜色与政治关系研究》，《安徽文学》2008年第9期。

^④ 《民国服制之初读会》，《申报》1912年7月15日。

^⑤ 《参议院纪要（本馆参议院特派员通信）》，《申报》1912年8月16日。

^⑥ 《礼制服章》，《中华民国法令大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增补再版，第1-2页。

^⑦ 《参议院讨论服制问题》，《申报》1912年6月19日。

^⑧ 明清律中的服制分为以下五等，也成为“五服制度”。第一等：（1）第一等：斩衰。服丧三年，丧服用最粗的麻布制作，不缉下边。（2）第二等：齐衰。服丧的期限有一年、五月、三月之别，丧服用稍粗的麻布制作，缉下边。（3）第三等：大功。服丧九月，丧服用粗熟布制作。（4）第四等：小功。服丧五月，丧服用稍粗的熟布制作。（5）第五等：缌麻。服丧三月，丧服用细熟布制作。

结”。^①更有议员提议将服饰制度中的丧服一项删掉。

至此，中华民族服制中的等级制度被基本废除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层与下层社会的服饰隔阂还存在。例如：职员、学生多穿长袍、长衫而农民一般不穿。不是法律不允许，而是受到根深蒂固的道德习惯的约束。

脱了长衫在外面走，简直人都显得矮了……平日并不是尊敬我，而是尊敬那件长衫！他们今日也不是侮辱我，而是侮辱这套短褂！……对于他们，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并不在无智与教养，而只在服装的差异而已。他们只知道穿长衫的是上等人，殊不知长衫客中却有不少沐猴而冠的呢！^②

其三，礼服面料倡用国货，常服不加限制。

服制中引进的西式服装原本多为毛、呢织品，但是当时中国的毛、呢还主要靠进口，而民初中国丝织品可以出口海外，^③服饰面料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经济的兴衰。因此，服饰的面料用毛、呢织品还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品问题，成为参议院讨论的重点，^④初读会会议决定大礼服、常礼服用有本国产的毛、丝、棉制品。^⑤该草案公布以后在商界引起极大反响，二读会中参议员提出礼服应禁用毛、呢制品，以杜绝漏卮。^⑥国家最后颁布的服饰制度中规定，礼服面料皆用本国丝织品。

由于服饰制度规定的是礼服的面料问题，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多选用物美价廉的西式机织毛呢、呢绒以及丝绸。^⑦服饰制度颁布以后，商界多次组织请愿团，要求政府规定服饰面料时要采用丝织国货为原料^⑧，反对舶来品以支持国货。1913年初，中华国货维持会正副会长，邀请女子协济社代表和青楼进化团众代表，讨论常服礼服的改良办法，期待这些领风气之先的女子能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支持国货，但结果都不了了之。^⑨中华国货维持会多次召开此类会议或者发表

^① 《礼制服章》，《中华民国法令大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华民国四年十二月增补再版，第1-2页。

^② 味橄《随笔：一件长衫》，《新中华杂志》1935年3月，第3期，第66页。

^③ 《礼制案已经参议院通过》，《申报》1912年8月13日。

^④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p59.

^⑤ 《参议院纪要（本馆参议院特派员通信）》，《申报》1912年8月15日。

^⑥ 《服制之争议》，《申报》1912年8月13日。

^⑦ 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⑧ 《国货维持会与丝绸机织联合会》，《申报》1923年3月6日。

^⑨ 《会议女服式纪要》，《申报》1913年1月7日。

声明，要求支持国货。^①他们希望政府将已定的服制重加修改，将未定的男女一切礼服，加以规定，最重要的是，要全部规定以丝织国货为原料，反对社会上风行的各式舶来品，支持国货。

民初服饰制定以后，除了商界请愿团请求“使用国货”以外，没有其它任何阻力出现，可见，国家制定服饰制度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与公众趋向一致。由于国家规定便服“暂听人民自由，不加限制”，服制对女子平时所穿的衣着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因此民国初年女子的服饰眼花缭乱，潮流更迭频繁。与国家规定的礼服制度中单一的礼服样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节 民初女装的多元化

古代历史上中国女装长期不变，是因为“女人用底衣服材料不但是受规定，甚至装饰品……都不能随意。所以在帝制下底装束很不容易改变。”^②而且帝国时代的服饰是用来分贵贱、明性别的，生活在1925年的老人仍然也对服饰的这些用途记忆犹新。报上登载了一对父女关于“人为什么穿衣”这个问题的讨论，老父亲认为：“冷天怕冷，热天遮身；贵贱分别，男女可分”。^③女儿认为还应该再填写几句：“你也要穿缎，我也爱穿绸；穿衣为美丽，都想出风头”。^④老人对上一个年代的记忆毕竟不适合民国的情况了。民国服制只规定了礼服，对便服暂听人民自由不加限制，人们自由着装的权利首次得到法律的保障。制度的变革加上西俗东渐、风气大开，社会上的流行服饰呈现多元化的景象：旧式的旗装没有被禁止；便于行走活动的短衣窄裤日益流行；更有女子服男子长袍、长衫者；代表文明与进步的西衣服饰受到追捧，服饰上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申报》上的一则报道称，“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⑤人们穿衣不能区分贵贱，甚至也不能分出性别。穿衣服也不仅为了美丽、出风头；有人通过穿衣服表达出对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向往；有的则为了实用方便。从等级服饰制度中解脱出来的女子尽情的宣泄各自的审美情趣，以此来表现自己独立的人格。

^① 《两团体征集规定礼服标准函——国货维持会与丝绸机织联合会》，《申报》1923年3月6日。

^② 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大公报》1935年8月3日。

^③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④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⑤ 劣僧：《改良》，《申报》1912年3月20日。

女子旗装

民国服制中没有禁止前清服饰的使用，男子礼服中依然保留了清代的长袍马褂，对女子旗装更是持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民国时期满人穿旗装并不足惊讶。民国初年的街上前清遗老遗少仍然穿着旗装。1914年春，某记者在拜访沙市后撰文《记沙市见闻》，文中谈及民国初年的沙市满人的生存状况、衣食住行，特别提及了满族妇女的衣着打扮。街市上来往的满人妇女，特别是比较贫穷的人仍然穿着旗服、挽着旗髻，向往来行人兜售自制的毛巾衣物，行人也不以满人妇女穿旗装为奇怪。

沙市去荆州十五里，荆州为前清驻防要镇，故满人甚众，然满人口众又皆能各自营业，以资生事，记者往来街市间，恒见满人妇女之贫者仍衣旗服、挽旗髻，手口其所制之毛巾衣履，等往来求售，而人亦不以其为满人也，稍呈轻侮状，其男子之从事于苦力者、小营业者皆有之，而富有资产以财雄于沙市者亦有之，总之，皆能自谋生计，不虞冻馁，较之甯镇满人求生不得相率履转□□者不翅霄壤，呜呼，沙市之满人更何幸而得此。^①



1918年6月的北京，风和日丽，庙会上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小商小贩云集，高声叫卖热闹非凡。来赶庙会的妇人中，身着旗装的满洲妇女尤众，^②女子穿着旗装显得甚是妩媚，当时有竹枝词，对此做了如下描述：
(图为民国初年身着旗装的满族女子^③)

蹁跹裙履寺中来，日暖风和庙会开，女子旗装增妩媚，斜阳反映到红□
(京师庙会之期，游人杂沓，满洲妇女尤众)

桃红柳碧艳阳天，窄袖春衫缓着鞭，并髻驰来西国妇，蹄声得得鬓云偏
(每值春季，常有西洋男女至城外试马，观者众)

但是此时的旗装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晚清到民国20年代婉容传世的旗袍照片可以看出，满族女子的旗袍也经历了一个由宽大厚重、不显露体形到后来

^① 平陆：《记沙市见闻》，《申报》1914年5月20日。

^② 莘田：《都门竹枝词》，《申报》1918年7月13日。

^③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第6页。

崇尚简约和线条美的发展过程。^①

女子衣裤竞紧窄

按照中国的传统，上层汉族成年女子多把裤子穿在袍或裙的里面。如果“有一个男人到他们家里，见到这位主妇只穿裤子，没穿裙子，那是大不敬”。^②“即使是穷人，也荆钗布裙”。^③只有一些富人的佣人、农村的劳动者，为了便于劳作会只穿长裤而不着裙。

到清末时出现一种袄裤（见下图左^④），这种裤子被长袄遮去大半，而且是大腰身、大裤管，裤管末端镶有花边。^⑤民国以来裤子的臀围日渐紧窄，裤管越来越细，这种裤子跟收腰紧身的袄相配（见下图右^⑥）。

紧窄衣裤既显身形，又利于行走是民国初年最流行的服饰。上海及各个沿海大都会中的妓女最先尝试了这种装扮，后来风气日盛逐渐推广开来。“不着裙之风气，实以海北里中人为最盛”。^⑦“迄今陋俗相传，几乎普遍于内地矣”。^⑧与清代宽博的服饰相比，收腰、



紧身袄与紧窄裤勾勒出了女性的身体曲线，紧窄的裤管下面可以毫无顾忌的露出不再缠足的双脚。由于职业原因，妓女穿着大胆，求新求异以吸引人眼球，她们求新求变不断的探索新型服饰。

除了妓女之外，民国初年的女学生也是女子着裤风气的倡导者和跟进者。此时的女学生追求服饰的新颖时尚，以至于“如今的时髦倜人，强半作学生装束”。^⑨自1911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制服规程令》以来，各校女学生“自中等学校以上着裙，裙用黑”。^⑩但是学生上体操课时需要运动，所以把更加灵活方便的短袄、长裤作为她们的“操衣”，后来学生觉得这种衣服，行走便利而且时尚，所以当时学生们不仅上课穿，上街的时候也穿。“有的终日穿操衣上课，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⑪女学生穿的紧窄短裤被人指责为“举止佻达，长袜

^①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②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香港：大华出版社，1974年，第38页。

^③ 一之：《上海观察谈之一节》，《申报》1919年6月25日。

^④ 胡铭、秦青主编：《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⑤ 胡铭、秦青主编：《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⑥ 胡铭、秦青主编：《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⑦ 一之：《上海观察谈之一节》，《申报》1919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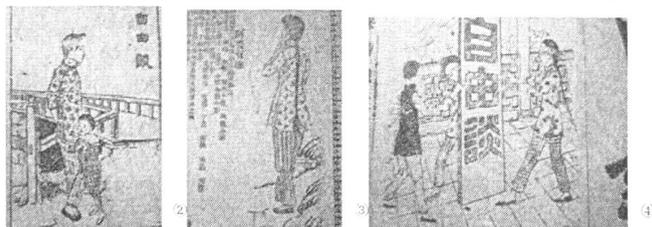
^⑧ 一之：《上海观察谈之一节》，《申报》1919年6月25日。

^⑨ 《对于女学生之厄言》，《妇女时报》，1911年4月，第4号，第10页。

^⑩ 《取缔女学生之服装》，《教育杂志》，1913年7月10日，第5卷，第4号，第30页。

^⑪ 《取缔女学生之服装》，《教育杂志》，1913年7月10日，第5卷，第4号，第30页。

猩红，袴不掩胫”。^①辛亥革命以后，女学生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她们追求时尚是表达她们主张自由、男女平权，不拘于旧俗的一种方式。



从《申报》的插图也可以看出，窄衣窄裤是民国初年最流行的服饰。画中女子窄衣窄裤，袖短露膊，裤短至踝，双脚天足。在许多见报文章中也经常提到这一现象。1913年夏天，这种紧衣窄裤的风尚还在继续，“上海妓女夏日衣裤，竟为紧窄，几于贴体无隙；四肢杈枒，织悉毕露，推其心，盖恨不得裸体耳”。^②这种贴身、显身形的服饰经常受到社会上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女子穿紧窄衣裤破坏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含蓄美，是世风日下的表现。

满清三百年里女子用厚重宽阔的服装把身体遮的严严实实，她们一代又一代人安静、迂缓、乖巧地呆在这个套子里。随着20世纪以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人际交往增多，女子的社会活动多了起来，服饰也普遍收窄，利于行走和做事；而且又符合现代的审美要求，紧窄衣裤的装扮不仅是时尚女子的追求更是时代的选择。

女子服男装

在中国古代，人们十分注重男女服装的区别，^③不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贫穷或工作方便，也有一些男女服饰同化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女效男装现象长期存在”。^④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内涵远远超过了服饰范畴，“不同时期的‘女服男装’都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意识，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

^⑤

清末上海青楼女子流行穿男装，“衍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⑥行走于路上，几乎分不出是男是女。妓效男装的风气对普通女性也产生了很大

^① 《取缔女学生之服装》，《教育杂志》，1913年7月10日，第5卷，第4号，第30页。

^② 《漫画》，《申报》1914年3月27日。

^③ 《漫画》，《申报》1914年1月29日。

^④ 《漫画》，《申报》1913年12月23日。

^⑤ 瘦蝶：《劝女界勿御衣裤》，《申报》1913年7月9日。

^⑥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⑦ 孙彦贞：《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女效男装》，《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第81页。

^⑧ 孙彦贞：《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女效男装》，《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第81页。

^⑨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6166页。

影响，一时间“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①妓女代表了现代城市的堕落，也代表了现代城市的吸引力与‘现代性’”。^②她们基本上处于时尚潮流的顶端，^③民国的女学生、社会名媛都以妓女着装为时尚，紧跟她们的潮流。

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人之衣饰，岁易新式，……又有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光、宣间，沪上衍中人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千尖皮袍者。然《路史·后纪》云：「帝履癸伐蒙山，得妹嬉焉；一笑百媚，而色厉少融；反而男行，弁服带剑。」此女子男装之初祖也。^④

对于清末民初的女性而言，着男装是一种另类的摩登，既是时尚的选择，又是追求男女平权的一种表示，意思是要和男子一样，起码在服饰上要取得平等。近代著名妇女活动家、教育家张竹君，“不仅积极创办女子实业学堂，还经常身着西装革履奔走演讲，被称为‘女界梁启超’”。^⑤革命家秋瑾女士，在清末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中是以男装形象著称。她说“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⑥她穿过长衫，也穿过西服，还留男士发型。“1903年中秋她穿长衫带仆人看京戏去了，丈夫王子芳一怒之下动手打了秋瑾，夫妻从此反目。”^⑦同年秋天，秋瑾在日本与友人会面时“穿着西式男装，横戴着的鸭舌帽掩盖了半个耳朵。蓝色的中世纪西装、背心显得很不合体。”^⑧1905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后，基本上以男性装扮为主：有时长袍马褂，有时“月白色竹衫一袭……梳辮、着革履”^⑨，秋瑾的男性化形象正是其不甘女性的卑微地位和柔顺心理的内心写照，她以男装的形象向旧社会、旧制度提出挑战。

^①（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7月，第6172页。

^②林少雄：《城市的影像与影像的城市——美籍华裔学者张英进教授访谈》，《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第76-81页。

^③劣僧：《改良》，《申报》1912年3月20日。

^④（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6166页。

^⑤孙彦贞：《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女效男装》，《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第86页。

^⑥【日】小野和子：《中国女性史》，东京：东京平凡社，1978年，第63页。转引自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48页。

^⑦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

^⑧【日】小野和子：《中国女性史》，东京：东京平凡社，1978年，第63页。转引自孙彦贞：《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女效男装》，《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第87页。

^⑨《秋瑾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97页。

民初北洋政府在制定服饰制度时，就有议员拟咨请政府“禁止女子服男子服”，有议员附议或者反对，并引起一番争论。^①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女子着男装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制度来制约的地步。1913年，上海某中学出现女扮男装的事情，“女学生乔装男子溺迹于某中学，诱拐同学生私逃”。^②此时学校也出现了诸如学生女扮男装的现象。



妇女如花不系裙，
背拖发辫腻而云。
若非耳有黄金坠，
扑朔迷离竟未分。
(此谓女儿男装带长耳环子)^③

此外，杂志^④上还刊登有外国女子着戎装、骑马飒爽英姿的画面，煞是好看。20世纪以来，女性纷纷效仿男子，着男装一时非常流行，“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鸭舌帽文明杖”^⑤，这不仅是当时青楼女子的时髦装扮，也是一些进步女性的刻意追求。

西式装扮

民国服制规定男子礼服与世界大同、趋用西式，而女子礼服则沿袭“上衣下裳”的传统旧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子也以穿戴西洋服饰为时尚和进步，最初西服大多进口，后来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专开介绍西式服饰的栏目，潮流之下西洋服饰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传统服饰平分秋色，并且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据包天笑回忆：“外国的丝袜，侵袭到中国来大概是在二十世纪初。最初不过是中国几个通商口岸的外国商店有得购买，后来中国人创办专销外国货的百货公司也有了。”^⑥时髦女性纷纷选择换下传统布袜改穿美观时尚的外国丝袜，红色、浅湖色、浅紫色，甚至还有透明丝质袜。在上海，很多女性纷纷将不够“文明”的传统布鞋换成西洋皮鞋。“女子外出踏青，不再穿以往流行的绣花鞋

^① 《参议员讨论复制问题》，《申报》1912年8月19日。

^② 觉迷：《上海春秋》，《申报》1913年12月21日。

^③ 《六十年前上海妇女装（之三）》，《上海特写》1946年2月。

^④ 《妇女杂志》1915年2月，第1卷第2号插图俄国皇族妇女之戎装小影，第216页。

^⑤ 《柔乡韵史》，文艺消遣所，1914年8月15日《遭遇解放》，第94页。

^⑥ 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香港：大华出版社，1974年，第34页。

了，大街小巷皮鞋声喧闹橐橐”。^①以往女子走路静悄悄的，无声无息更加感觉地位卑；而“今日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②响亮的皮鞋声敲打出女子走向自强自立的旋律，似乎也象征着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时髦女子多半已放弃了中式百褶裙，归国留学生^③是西式裙裾的积极响应者，当然不乏其它追求新奇与时髦的女性。据调查，“武昌各处，因改西装衣履冠服，输出金钱已逾二千余万”。^④另据海关调查“津埠进口之洋服、洋帽二项，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两。一埠如是，上海各处可知。春季如是，去冬今夏可知”。^⑤民国初年西洋服饰虽然刚刚开始流行，但是其势头强劲，引起民族资本家的担忧。

下面这组图是针对国人模仿西人的讽刺漫画，^⑥嘲笑中国女子效仿西方凸其乳、蜂其腰、着西服。中国传统服饰没有强调腰线、胸线、臀线，^⑦而西方女子服饰以腰部细为美。女子摹仿西人凸乳、细腰、穿西式礼服带礼帽，这些举动完全挑战和颠覆了以往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女子新奇乖戾的衣装打扮无不是其心底叛逆的写照。



此外，她们越来越多的放弃了质料厚重、质感粗糙、色彩单调的传统服饰材料，更愿意选择简明、整洁、色彩感强的西方机织布料。中国传统棉制品、丝织品重保暖、宽松，不大适用于在裁剪上强调立体感与线条美的西服原料，而西式机织毛呢、呢绒、丝绸除了能做西服外，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衣料的特点^⑧，而且西式服装衣料用机器纺织而成，价廉物美，愈来愈人们的喜爱。据统计，绒货、绒棉货、疋货类的进口，民国元年是 7848689 海关两，民国 16 年即达到 12539002 两，10 年内增加近 60%。^⑨

民国时期的女子服饰从样式到装饰，从裁制到布料，从人体审美到心理都呈现出对西方的无限青睐。浏览民国初年报刊杂志，会发现人们的眼光自觉不

^① 谷夫：《咏沪上女界新装束》，《申报》1912年3月30日。

^② 匹志：《今昔女子观》，《申报》1912年2月1日。

^③ 锺黛：《京华哭梦杂记》，《申报》1919年9月16日。

^④ 《田骏丰等建议咨请政府速定制服服色振兴呢业案》，《申报》1912年6月4日。

^⑤ 《田骏丰等建议咨请政府速定制服服色振兴呢业案》，《申报》1912年6月4日。

^⑥ 这一组漫画连续刊登于1912年4月的《申报》上，分布在第222、232、250、260、270、280、290页。

^⑦ 参看《人体美》，《妇女时报》，1911年第2号，第7页—第11页。文中强调西洋妇人之服现颈腰、日本妇人现颈膝、中国妇人与西洋妇人略似，不过腰关节不甚清楚，即不显腰。

^⑧ 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⑨ 《中国年鉴》（第一回），第1637-1638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自觉的都聚焦到“效法西人、趋用西货”这个话题上来。此时女子在服饰上的“崇洋”心理，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众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向往。

小结：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由帝制时期进入共和时代，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转变。服制的变更，正是时代变革的一种体现。北洋政府在制定服饰制度时表达了向西方学习，与世界大同的态度。社会风气也迎合了这种要求；服制中弱化了用服色、丧服条例来规定社会等级秩序的功能，服饰等级制度基本上被废除；男子长袍马褂与女子“上衣下裳”的前清服饰得到保留；此外，国家提倡服饰面料选用国产丝、棉、麻、毛织品以支持民族经济。

尽管国家制定服饰制度时规定女子礼服无多变更，只要延续前朝服制则可，但由于对常服不加限制。这就给民初女性在着装方面提供了多元化选择的机会。她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时下风尚不停地更换着各式新式服装，在男子主导的社会秩序范围内频繁更替着自己的衣裳，用服饰阐释自己的主张。

此时女子服饰上的“崇洋”心理，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向往；流行的紧窄衣裤也展现了人们积极摆脱传统服饰形制上厚重臃肿，面料上质感粗糙、色泽单调的老旧格调，期望在外表上追求简明、整洁，色彩斑斓的崭新精神面貌；民国初年“女子服男子服”更是先进女性的刻意追求，体现了辛亥革命以后女性要求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在服饰上的体现。

第二章 五四运动与服饰

第一节 五四运动时期服饰的新变化

五四运动与女子服饰——文明新装、女子长衫

“上衣下裳”是中国女服的最基本样式。晚清到 20 年代后期的女子裙装可以粗略的分为以下两种：清末传统的长衣长裙——“上衣下裳”；民国初年来自日本的窄长衣黑长裙——“文明新装”，后来该服装的裙摆长度上调。

满清时期宽博的“上衣下裳”，主要是汉族女子的服饰，而满族女子穿一件制的长袍。从乾隆年间，随着两个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满汉女装互有学习^①，都有穿“上衣下裳”这种服饰。

民国初年，由于留日学生甚多，服装样式受到很大影响，“其中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年轻女学生和思想进步女士穿袄裙时不施花纹，不戴簪钗、手镯、耳环、戒指等饰物”。^②因此，这种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以区别于清代的服装。这种服饰的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长袄，摆长不过臀，袖短露肘或露腕呈喇叭形，衣摆多为圆弧形”。^③这种“文明新装”的黑色长裙为套装式，“长至足踝，后来逐渐至小腿上部”。^④



(1919 年 5 月 31 日上海学联为纪念五四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个学生郭钦光^⑦而召开追悼会，与会者 3 万余人^⑧，皆头戴白帽^⑨)

^①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1 页。

^② 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年，第 125 页。

^③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出版，第 21 页。

^④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出版，第 21 页。

^⑤ 郭烈士追悼大会记，《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 1 日。

^⑥ 郭烈士追悼大会记，《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 1 日。

^⑦ 郭钦光（1895-1919），北大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中第一个牺牲的学生。

^⑧ 郭烈士追悼大会记，《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 1 日。

^⑨ 五四时期学生们流行戴一种白色小帽，又被称为“爱国帽”，男女同学皆可戴。学生们用这种白布软帽取代之前行流的东洋草帽，是身体力行的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的表现。

照片是当时上街游行的学生，她们放弃了宽博繁复的“上衣下裳”，普遍改穿这种朴素简洁，便于行走和活动的“文明新装”。当时有人自称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但由于其服饰奇特而被人辨出。某日有数女生自称务本学校女生，上街散发传单和举旗游行。但是由于服装离奇并不像该校学生，后被调查出来该校当日无学生游行。^①学生上街游行时穿的这种被贴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标签的服饰和装扮甚至可以给败坏分子当保护伞，报道称，五四期间有人冒充学生上街至各处胡闹败坏学校、学生名声^②，还有人穿着学生装假扮学生散发宗教性质的传单。^③

下面这则材料写于1920年，作者是一位出生于1900年的女生，她经历了清末到民初服饰的巨大转折期。五四运动结束后的1920年，20岁的她穿的已经是短衣、短裤或者短衣、套裙了。根据她的描述，此时女子流行服饰中的上衣下裙就应该属于“文明新装”——“身裹大、袖口大；出手很短、手臂、小腿多露外面，裙子变作套裙”。^④

“文明新装”属于套裙，区别于中国传统服饰“上衣下裳”中的“裳”，“裳”属于罩裙，即裙子下穿裤子；而套裙下面则不穿裤子。自从有了“文明新装”，中国“传统女子服饰不能暴露身体”^⑤的习俗被打破了。作者还提到现在的衣服“不取花样”，比较朴素，各种装饰品也被淘汰。她认为现在的衣服宽大、脚也不缠，女子无拘无束，起码在服饰上同男子一样了。

我从娘胎里出来，到现在，虽只有活着二十年，但这二十年中间留心细查妇女装饰变迁了多少？现在姑且把来谈一谈：

在清时候，多是缠足，或装高低，长衣大袖镶条很宽。颜色无非大红、玫瑰紫、天青等。头上戴着的、手上戴着的，多是很笨重的东西。现在乡间还可以见到这怪象。

后来足也渐渐的不缠了，粉和胭脂也不擦了。那衣服长短、出手、纽扣镶宕，不知变了多少。我们桐乡僻壤地方，也跟着变更。我还记得：有

^{①②} 海上闲人编：《民国丛书·上海罢市实录》第三编（65），《上海罢市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9页。

^③ 海上闲人编：《民国丛书·上海罢市实录》第三编（65），《上海罢市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9页。

^④ 海上闲人编：《民国丛书·上海罢市实录》第三编（65），《上海罢市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49页。

^⑤ 震汉：《妇女服饰的我见》，《新人》，1920年7月，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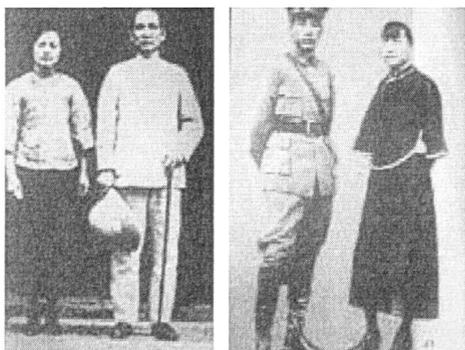
^⑥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一时，大家盛行身裹狭小的衣服，和肉体密密的接着。

到了现在，已不知经过多少改革，才有短衣、短裤，身裹也大了，袖口也大了；不过出手很短，手臂、小腿多露出外面，好像我们学校内的运动衣。裙也变作套裙了，颜色也不取花样了。那装饰品：如戒指、手镯、响饰也渐渐的淘汰。

我们拿从前来比较：从前缠了足，虽然宽大的衣服穿着，但可免现出那种柔弱的态度，幸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衣服很宽大，脚也不缠，简直无拘无束和男子一样（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①

穿“文明新装”者，以女学生或一些先进社会女青年居多。下图分别为身穿“文明新装”的宋庆龄与孙中山于1921年在广州的合影，以及陈洁如与蒋介石于1920年代初在广州的合影。^②其中陈洁如的这身装束，特别是宽袖圆摆的上衣，是当时时尚女装的标志。



五四运动给简洁朴素的学生装增添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五四运动时期学生走上街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使得一大批女子走出家门进入学校，进而又从学校迈向社会。五四运动时期，游行队伍里高举旗帜、高呼口号的爱国形象，已经深深地织入灰衫黑裙或蓝灰长袍中，勇于冲破旧

藩篱，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深深地铭记在人们心中。

五四时期，有不少激进人士主张女子剪短发、穿男装，“断发男服”，^③认为这样有利于女子在社会上活动和自由工作。断发后的女子着什么样的衣服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其实可以在五四运动中找到答案，“当时的男学生、男教师们为了表示爱国和抵制外国货的决心，穿起灰色、蓝色长衫、长袍，上街游行”。^④后来加入战斗的女子碍于裙子行动不便，开始学习男生，穿长衫、长袍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等。这种风气传至各大城市女界，当时上海妓女扮成女学生上街

^① 震汉：《妇女服饰的我见》，《新人》，1920年7月，第53页。

^② 胡铭、秦青主编：《民国社会风情图录，服饰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14页。

^③ 许地山：《女子的服饰》，《民国日报》1920年1月30日。

^④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97页。

游行、散发传单，她们头戴白帽身着长袍，高呼口号声援被逮捕学生^①。

民和右妓女占春、及新民庆月贞，昨服女学生装，手持青楼救国团传单，乘坐黄包车在三马路一带分散行人。三马路沿老林黛玉门前，被人偷贴红纸对联一付。文为：“少年学子救国多热忱，老弱妓女口征无心肝”，文虽不通，见者莫不捧腹。^②

五四运动后人们开始讨论女子穿长衫的问题，有人认为女子穿长衫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方便，“女子上面着了外衣，下面着了裙子，太不方便，倘使着长衫，只一件便够，可省时省力”。^③此外，穿短衫容易受寒，“但着了长衫，上下都暖，而且夏天，比着裙风凉”。^④女子着长衫的好处还有很多“比衣裙好看，而且省钱”，^⑤上下两件衣裳用料较多，如果只着一件长衫，可节省布料和金钱。女子着长衫之后，“便与男子没什么分别，男子看不出是女子，就不起种种坏心思了。或者女子在社会上的位置更高得多”。^⑥

有人对女子着长衫持反对态度，因为“长衫在工作上最不便利”，又是惰性的表示。拆穿了说，和现在女子穿的裙，丝毫没有两样”。^⑦作者从便利的角度认为女子穿上衫是换上了变形的裙，没有什么差别。相反，此人比较支持短衫，因为“短衫在精神上、卫生上都比长衫好得多，在工作上又很便当”。^⑧

冯玉祥反对长衫、长袍“力诋长袍之腐气”，^⑨他认为男女长袍地位相等，但是他不反对女子穿这种有腐气的长袍，而且还堂而皇之的给女子着长袍找了一个的理由：

冯玉祥语尚透彻，早为人所景仰。当冯氏在京时，尝在某处讲演，力诋长袍之腐气，并谓袍裙故处相等地位，顾男女生理不同，盖女子恒以新潮高涨，猝不及防为苦，故裙色尚黑，用以障蔽，固未可厚非也。可谓语

^① 海上闲人编：《民国丛书·上海罢市实录》第三编（65），《上海罢市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31页。

^② 海上闲人编：《民国丛书·上海罢市实录》第三编（65），《上海罢市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1页。

^③ 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

^④ 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

^⑤ 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

^⑥ 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1920年3月20日。

^⑦ 瀚谷：《服装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4月11日。

^⑧ 瀚谷：《服装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4月11日。

^⑨ 遇春：《裙之妙用》，《申报》1929年4月18日。

妙天下，然则今之旗袍，固亦渊源有自，不失遗风欤，一笑。^①

民国建立之处女子急于摆脱宽大厚重的长袍阔裙，换上了合身便利的服饰；但是在提倡妇女解放的五四运动时期，又有人出于男女平等的政治理想而提出妇女改换长衫。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提到女子穿上长袍，“不是为了效忠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②

最初的旗袍就是从女子改穿男子长衫、长袍开始的，旗袍原本表达了男女平权的政治诉求。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妇女解放以及女权主义的盛行，先进女子开始穿长衫、长袍，以示其对男女平权的要求，起码在服饰方面要与男子一样。这种与男子长衫近乎相同的长袍就是后来风靡一时的旗袍在五四时期的模样。

五四运动与男子服饰——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

长袍是一种右衽、过膝的服装，长衫是长袍的一种“制如长袍，唯无棉絮”。^③长袍、长衫是汉族传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入关后，加入了满人的马褂、马甲，就形成了清代男装的典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种传统服饰饱受改良派、革命派的批评，成为被西式服装代替的对象。北洋政府的服制规定“常礼服二种，一为西式，一为袍褂式”。^④把长袍、对襟马褂作为两种礼服之一，以适应社会的习惯。由于西式礼服并不切合中国国情，“民初男子服饰仍以长衫、马褂最为普遍，并更为讲究量体裁衣”。^⑤



五四运动时期，有的学生与教师选择穿灰色或蓝色的简朴传统长衫、长袍，^⑥以表示他们抵制外货支持国货的爱国之心。但是传统服饰长袍、马褂的穿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很流行“下边穿西式长裤、皮鞋，外穿长衫，头戴圆檐礼帽；或者长袍马褂佩戴礼帽（见左图）”^⑦，这种中西

^① 遇春：《裙之妙用》，《申报》1929年4月18日。

^② 张爱玲：《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第73页。

^③ 周汛、高春明编：《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192-211页。

^④ 《政府公报》，1912年10月4日（第157号）。

^⑤ 谢金伶：《清末民初北京服饰的变化研究》，2007年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史专题研究会议论文，第2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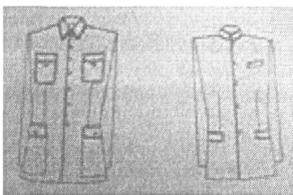
^⑥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97页。

^⑦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合璧的穿着方式看起来似乎不伦不类，但是在五四这样一个既讲民族主义又向西方学习，既要与世界大同又反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时代，不是传统服饰被西化，就是外来服饰被民族化，总之，五四时期中西合璧的服饰看似不伦不类，却又显得最为合理。

西装在清末民初的流行，与戊戌变法时期提倡西式服装有关，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多选择西服，“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以为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①革命人士选择西服，以示维新和革命之志。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洋政府将西式服装定为礼服，西装的地位提高了。西式服装不仅得到了合法的地位，而且很快成了时髦的服装，“洋货旺销，无不利市三倍”。^②“西装主要为部分官吏、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穿。”^③老年人、商店活计以及一般市民很少穿西服，当时以穿西装为时髦。从1911年12月29日，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有分别来自17个省的40余人参加，其中“有60%的人穿长袍马褂，40%穿西装”。^④

五四运动以后，西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激烈的反对传统，要求变革传统服装，趋用西式服制；另一方面，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之下，“穿西服洋装被人看不起，仿佛丧失了人格、国格，被称为‘假洋鬼子’”。^⑤1919年五四运动，激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主要表现为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用爱国布、戴爱国帽、禁服西服等。^⑥此时，一种既体现西方文明，又能显示出传统特色的服装——中山装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



由于对中式“长袍马褂”不满、特别是在民国西服盛行的刺激之下，孙中山受到民族自尊心的驱使，对西式学生装加以改进，^⑦（见左图^⑧，左为中山装，右为西式学生装）

^① 《言论·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② 《皖商会关于筹安会之往来函电》，《申报》1915年9月7日。

^③ 谢金伶：《清末民初北京服饰的变化研究》，2007年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史专题研究会议论文，第206页。

^④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⑤ 段吉福、王康著：《旗袍·草裙·花帽——五彩缤纷的服饰习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⑥ 段吉福、王康著：《旗袍·草裙·花帽——五彩缤纷的服饰习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⑦ 学生男装形制比较简单，“一般都不用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不用系领带、领结作为装饰。在衣服的正下方，左右各缀一只暗袋，左侧胸前还缀有一只明袋。学生男装明显的“接近于清末从日本引进的制服，而日本的这种制服也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参见周汛：《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第312页；林清英：《扶桑新装》，《专刊汇编》1929年11月26日。

^⑧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设计出了具有中华民国特色的中山装，^①在传统服饰被反对，西式服装又会被视为“假洋鬼子”的五四时期，中山装成为外来服饰民族化的典型。

总之，五四时期的女子“上衣下裳”依然存在，主要在较为保守的年长者当中使用，而新式的“文明新装”则主要在学生界以及先进社会女青年中流行，同时“女子长衫”则成为倡导男女平权之女性的选择。五四运动时期的男子服饰中也是传统服饰与西式服装并存的局面，中式的长袍、长衫和马褂、马甲依然被很多中国人保留使用；此时的西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激烈的反对传统，要求变革传统服装，趋用西式服装，另一方面，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激荡中，穿西服又显得不合时宜；而中山装则成为外来服饰民族化的典型。

第二节 五四运动对南京国民政府服制的影响

国服的形成——中山装、旗袍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过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文化和政治剧烈变革的时代，人们称之为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以民主、科学为基调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但是五四时代也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它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反传统的；另一方面它是世界主义的，又是排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情绪，国人一刻也没有忘记从服饰方面寻找民族主义的出路，人们对服饰赋予民族主义色彩的过程就是中华民国国服产生的过程。

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字命名的中山装或中山服，是由孙中山先生对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西式学生装进行改良而来。^②这种服装“既保留了西装的平整、刮挺、又有衣兜的特点，又具有当时中装高领、庄重的特色”。^③而且穿上中山装后“挺胸凸肚确能显出国民真正精神”。^④西式服装本土化以后，再加上对中山装设计理念富含民族化寓意的解释，中山装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① 关于中山装的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认为中山装是对西式学生装的改进；有的认为它是广东服装的改变。笔者认为，中山装是对日本童子军制服以及学生装的改良。

^② 【日】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页；郭先登：《论中国服饰发展趋向的几个理论问题》，《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7页。

^③ 张静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④ 高风：《隽语：昔日之新装》，《专刊汇编》1929年11月26日。

前襟的4个口袋标示儒教礼、义、廉、耻，认为此为国之四维；门襟5扣则含五权（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权）分立的意思；袖口3纽那是寓指（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①

五四时期的民族情绪高昂的中国人，太需要一个有民族特色的国服来维持民族自尊和抵御西方了，吸收西方服饰又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中山装，在1929年4月正式被纳入服制，得到官方认可。南京国民政府在服制中规定如下：

一·褂式如一图，齐领对襟长至腹，袖长至手脉，左右及后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制品，色黑，纽扣五。^②

“国民党制定宪法时，将其定为礼服，并规定凡特、简、荐、委4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先生之法。中山装也作常服穿着”。^③总的来说，中山装是中华民国时期政界和军界的一种官服，之后在知识界、教育界开始受到欢迎。这种服装随着南方革命势力影响的扩大，借着五四运动的契机，以及人们对孙中山的敬仰而逐渐流行开来，1929年4月被国民政府纳入服制、定为礼服后奠定了其法定地位，进一步促进了中山装的流行。一个来源于西方的服饰就这样变成了中华民国的民族服装。

旗袍是一种来源于满族的服装。如果按照辛亥革命的逻辑，满族服饰是应该被革命掉的东西，但是20年代以来，源于满族的女子袍服慢慢被改造成中华民国的民族服装。（详见第三章）



在辛亥革命之后，汉族妇女采取上衣下裙的服饰，^④只有满族妇女，继续维持着她们的服装。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子袍服保留了满族女袍“一件制”的基本因素，而且跟当时男子的长袍、长衫非常相似，初兴的旗袍严冷方正，是对男子服饰的刻意模仿（见左图^⑤）。女子长袍在五四运动中被赋予了爱国、男女平权、民主、自由的意义，这是旗袍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五四运动以后旗袍受到西方服饰

^① 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②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第1236页。

^③ 黄士龙：《中国服饰史略》，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④ 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263页。

^⑤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及其审美观的影响，彻底走向西化；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把正在流行中的旗袍定为国服不仅因为它属于传统服饰，更因为此时的旗袍承载了现代的文明，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南京国民政府服制条例中对旗袍的描述如下：

第二条 女子礼服依左列甲乙二种之规定

甲种

一·衣 式如第四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制品，色蓝，纽扣六。^①

旗袍保留了满族女子袍服“一件制”的基本理念，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审美观念对女子袍服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最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旗袍基本定型。旗袍与中山装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改变、流行到定为国标的过程。从满族袍服变为中华民国国标的过程是被是中华服饰文化与异文化交融的过程也是传统服饰西化的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服制新变化——五四女学生装与公务员服制

五四时期女学生率先穿起上面低领收腰的圆摆短袄，短袄的袖长至肘部；袄下面是不加绣饰的黑色长裙，“颜色也不敢花样了，那装饰品也渐渐的淘汰”。^②五四运动时期简洁朴素而且含有爱国志趣的女学生装成为广受欢迎的服饰。这种服饰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饰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第二条 女子礼服依左列甲乙二种之规定

乙种

一·衣 式如第五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过腰，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左右下端开，质用丝麻棉毛制品色蓝，纽扣五

二·裙 长及踝，质用丝麻棉毛制品，色黑

三·鞋 质用丝麻棉毛制品，色黑^③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民主运动中

^①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第1236页。政府发布的《服制条例》中规定旗袍礼服内着裤，但是从民间流行旗袍，特别是开衩旗袍可以看到，民间流行旗袍里面不着裤。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探究。

^② 震汉：《妇女服饰的我见》，《新人》，1920年1月，第53页。

^③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第1236页。

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女子到社会上学习、就业、活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南京国民政府服制中除了男公务员制服条例以外还加入了对女公务员服饰的规定。

第二章制服

第五条 女公务员制服，依左列之规定

一·衣 同第二条甲种一之规定惟颜色不拘^①

总体来看，它把北洋政府时期纯西式的大礼服改为具有中华民国特色的中山装；把民初女子礼服制度中具有传统特色的“上衣下裳”改为具有民族特色和更具现代意义的旗袍；同时把五四运动时期很流行的颇为西化的女学生装也纳入服制，此外五四时期女子外出参加工作的现象也从女公务员服制条例中得到体现。

一方面可以说服饰制度更加趋于西化，因为中山装本来属于西式服装，旗袍也是传统服饰被西化的典型，学生装也是来源于西方的服饰样式。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服制中挣扎着保留有传统的因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此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时代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时代，在既讲求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又要走向世界主义、向西方学习。所以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南京国民政府服制不仅追求服饰的现代化同时也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民族认同。

服饰制度的制定还对国产织缎业有相当大的影响，1929年南京市工商业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29年织缎业户123家，工人1,847名，木机970架。资本总额78,590元。出品年额25,025匹，价值882,974元。自民国服饰制度制定以来，舶来品充斥市场，绸缎销售量下降，现在的销售只有广东、福建、东三省、北平等地，欧美甚少，^②南京市社会局调查是为了查明实况以资改善。服饰制度的规定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关系到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① 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第1236页。

^② 《统计月报》，1929年1月，第5期，第38页。

小结:

五四运动时期简洁朴素的学生服成为广受欢迎的服饰。就女子服饰而言“文明新装”即短袄配黑长裙是五四以后的潮流服饰。但是五四运动时期在自由平等男女平权思想刺激下开始出现的女子长袍、长衫开始成为当时女子服饰的一部分。女子传统的“上衣下裳”逐步过渡到上衣下裙，裙里面又穿裤子这种被认为既浪费又保守的中式着装方式逐步被“文明新装”、旗袍等取代。

五四运动时期的男子服饰也出现了新变化，中式的长袍、长衫和马褂、马甲依然被很多中国人保留使用，但是多采用“中西合璧”的穿着方式；此时的西服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激烈的反对传统，要求变革传统服装，趋用西式服装，另一方面，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激荡中，穿西服又显得不合时宜；而中山装则成为西式服装民族化的典型。

五四运动时期中山装与旗袍经历了一个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过程，既保留了民族传统又有现代服饰特征的中山装、旗袍被南京国民政府纳入服制。中山装是把西式服装本土化以后，再加上对其设计理念富含民族化寓意的解释，借着南方革命势力影响的扩大，与五四运动的契机，以及人们对孙中山的敬仰而逐渐流行开来，1929年4月被国民政府纳入服制、定为礼服后奠定了其法定地位，进一步促进了中山装的流行。女子长袍在五四运动中被赋予了爱国、男女平权、民主、自由的意义，这是旗袍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五四运动以后旗袍受到西方服饰及其审美观点的影响，彻底走向西化；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把正在流行中的旗袍定为国服不仅因为它属于传统服饰，更因为此时的旗袍承载了现代的文明，是现代化的产物。

五四这样一个既讲民族主义又向西方学习，既要与世界大同又反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时代，五四运动的服饰不是传统服饰被西化，西方服饰被民族化；五四运动以来长袍马褂的穿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很流行西式长裤、皮鞋，外穿长衫礼帽；或者长袍马褂佩戴礼帽；此外传统的宽后笨拙的旗女之袍演变成显身形、有韵致的旗袍，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服饰吸收了西方服饰文明的具体表现。而此时中山装成为外来服饰民族化的典范。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制定服制时把五四运动以来，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旗袍定为国服；此外还把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学生装列为女子礼服，还规定女公务员的服制，这些都是五四运动以来女子参与社会活动在服制中的体现。

第三章 旗袍被穿成时尚的历史

从民国近 20 年服饰变迁的总体趋势来看，此时的服饰基本上处于传统服饰被西化，以及西式因素被吸纳与借鉴的阶段，旗袍就是一个典型。本章以旗袍为例，试图从近代旗袍的变迁中详细讨论旗袍如何从一个传统服饰开始趋向西化，当时女子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及时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与看法。

因旗袍二字中的“旗”字，很多人认为旗袍缘于满人的袍服。但是殊不知旗袍在广东的名称叫“长衫”，由于这一名称的存在，又使得旗袍与男子长袍沾上了的关系。当 20 年代初西方审美观念进入中国时，中国人开始对身体线条美、曲线美有了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也促进了旗袍的改良。安东篱教授还认为清末天足运动，间接地促进了旗袍的流行^①。对于旗袍的起源和流行，人们有各式各样的迷惑和猜测，其实旗袍是一种复古款式、改良品种。毋庸置疑旗袍的形成是长时间内多方面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1929 年南京政府在制定新服饰制度时，把正在流行的旗袍定为女子礼服。从国家层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新的服饰制度时把与源于满族袍服、且受到男子长衫启发但更具西式审美特色的旗袍定为礼服，使得一种最初为少数民族的服饰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又是什么力量以及什么样的人，推动着女子服饰向旗袍迈进，在此期间体现了女性怎样的参与？早已习惯穿两件制服饰（上衣下裳）的女子，为何突然对一件制的袍服表现出这么浓厚的兴趣？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从旗袍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解答这一系列的疑惑。

第一节 影响旗袍形成的因素

清代旗女“一件制”之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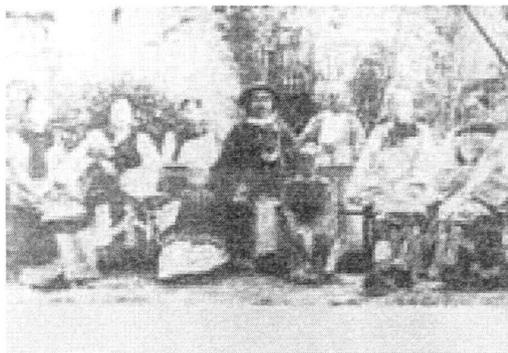
满清服制仍然属于礼制和法律的一部分，满清入主中原以后，通过变革服制来巩固其统治。新制定的服制，是满人在长期骑马射箭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满族民族特色的长袍马褂，箭衣小袖，深鞋紧袜，薙发垂辫，取代明代以来汉族宽衣大袖，蓄发挽髻的传统装扮。

^①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85.

新的服制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汉人认为，被蛮夷统治是汉民族的耻辱，所以满清服饰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种种激烈的反对。总体而言，满清入关后制定服制强制易服，只是就男子服饰而言。鉴于女子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强令推行“剃发易服”时，实行“男从女不从”，^①因此女子服饰出现了满汉分途并各具特色的局面。（见下图^②）满汉女子服饰上最明显的区别是满族女子的衣裳连属“一件制”，而汉族女子依旧是中国女子传统服饰中的“上衣下裳”（包括裙和裤子）制。



满族妇女的服装大体上与男子相同，属于上下连属的一件制服，^③“长至蔽足……袍不开气，行时以不动尘为礼云”。^④旗女最典型的装束莫过于“输两把头，大装戴钿子，身着蔽足旗装，脚穿花盆底鞋，袍外常套马甲”。^⑤而汉族女子依旧承袭明代旧服饰，“平头圆髻，上着右襟袄衫，下着长裙，脚穿弓鞋”。^⑥汉人妇女“不得穿马褂儿、坎肩儿，便服上衣仅过膝，腰下另穿罗裙，有如围裙，宽而多褶，在自家不穿裙，下婢女等不得穿裙”。^⑦汉族女子不得跟男子、满族女子一样穿“一件制”长袍和马褂，这种赤裸裸的歧视为后来渴求男女平等的先进女性穿长袍、长衫并称其为旗袍埋下了伏笔。



满汉妇女服饰这种各自独立的格局从乾隆年间开始有了变化。^⑧随着两个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满汉女装也相互影响，各自取长补短。左图^⑨是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其中妇女的衫裙，已经或多或少的具有了汉族女装的特点。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妇女服饰急剧衰落，

^①（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003年重印）。

^② 照片展示了晚清满汉女子的典型服饰：右边的女子梳如意头，着满族女子长袍，左边的女子梳着苏州髻，穿着长袄和长裙。照片引自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

^③（明）史玄、（清）夏仁虎、闾明：《旧京琐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页。

^④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47页。

^⑤ 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第47页。

^⑥ 谢金伶：《清末民初北京服饰的变化研究》，2007年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北京史专题研究会议论文，第199页。

^⑦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⑧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繁琐累赘的旗装、花盆底鞋、钿子等多被淘汰，旗女“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脚跟形势先融化，说道莲钩六寸长”，^①穿长袍的满族女子渐趋减少。

民国成立以后虽然在政府的服饰制度中没有禁止满族服装，也有女子仍穿着旗装，不过一些时尚、先进的民国女子早已放弃了又长又阔的服饰，换上紧紧贴身、行走便利的上袄下裤。民国时期的天足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族女子放足，但是她们发现天足与汉族服饰不配，所以她们把目光投向不缠足的满族女子的长袍。^②后来广为流行的“一件制”袍服被称为“旗袍”。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见本章第二节）

西洋服饰对旗袍形成的影响

初兴的旗袍继承了满族女子袍服的“一件制”因素。^③加之在五四运动时期，女子对男子长袍、长衫的刻意模仿；因此，当时的女子袍服面料厚重笨拙、不显体形而且袍内需穿长裤。^④1920年以来，随着西方服饰与审美思想大量进入中国，当时的报刊杂志，常刊登西方女子的流行服饰。新型女子服饰多借用西方服饰的因素：如蕾丝、花边、纽扣和蝴蝶结等，而且，在裁剪上开始注重立体美和曲线美。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旗袍也不例外，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西方元素。

随着沿海口岸城市的设立，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兴办女子学校，以上海为例，1890年，美国传教士海叔德（Laura Haygood）筹建的中西女塾，1851年，美国圣公会教士琼斯女士（Jones）在上海虹口设立的文纪女塾，1881年改名为圣玛利亚女校，教会学校里面的学生穿着就非常的西化。当时上海著名的几所教会学校中都有女学生穿西式裙纱的现象，这种薄纱、蕾丝与斜角裙边把女子身体的线条美衬托的曼妙多姿。这些教会学校中的穿衣风气，直接受到西方服饰的影响，而且时人对此现象也不吝赞美之词。^⑤

当时人们向西方学习和借鉴也表现在扣子方面，中国人除了传统的用布盘扣和以带结衣之外还学会了用西式纽扣。同一时期的《妇女杂志》上，也有许多关于纽扣如何制作的文章。传统中国衣服上缝制的扣子是布做的，而近代以

^①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第242页。

^②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84.

^③ 也有人认为，旗袍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可参看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④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9-14页。

^⑤ 一之：《杭州观察谈之一节（中）》，《申报》1920年1月13日。

来受西方影响服饰上的纽扣多是西洋物品，效法自国外。下面第一幅幅巨幅广告中（见下图左^①），女子短衣上有一列纽扣，此种装饰实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下面的这幅照片（见下图右^②）是今人收藏的民初长裙，从花边和蝴蝶结来看，它明显受到“西风”的影响。



除了装饰蕾丝花边、纽扣等细节上摹仿外，为了衣服更加时髦，裁缝在衣服的裁剪上也开始注重立体美。中国旧式的衣服“皆系平面的，便于叠褶收藏，但是于身体上则波痕较多”，^③“近来海上之时装，咸趋欧化，于制裁上多注重于立体观念方面矣”。^④这里作者鲜明地指出了中国服饰在裁剪方面，经过了从注重平面到注重立体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是为了趋于欧化，裁剪上的立体观念是向欧美学习的结果。

此时中，国服饰除了在裁剪上吸收了西方注重立体美的特点之外，在人体审美方面也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审美观，认为衣服的作用就是要体现人体的曲线美，所以衣服应该显现出颈部、腰部、膝盖中的两个部位。我国女子服饰与西方女子服饰对美相类似，但是在腰关节之处还显的不甚清楚。^⑤1920年代中期流行的改良旗袍的裁剪就融入了追求立体、追求腰部曲线美的思想。

现今普通之衣服也，三关节中除去其一，此法最为中庸，既不起肉感又能发挥固有之美形，但各国不同，西洋妇人之服，现颈腰二关节，遮去膝关节，腰以下成一部分矣，日本妇人现颈膝二关节，遮去腰关节盖日本妇人以大带饰其腰也，衣服紧裹两髀，故膝关节亦宛然现出。我国妇人之服，与西洋妇人略似，不过腰关节之现出不甚清楚耳。以此三种衣服比较，西洋妇人服当居最下，盖裸体形之特异之点，实在腰关节，故此点现出则起肉感之部分甚多也。我国女子之不裙者，绝无美感，盖两髀之形状悉现于外与原形相去无几矣。^⑥

^① 《漫画》，《申报》1920年6月6日。

^② 戴云云著，马元浩摄：《飘逝的罗裙：上海怀旧女子服饰纪事》，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③ 漱梅：《服装漫谈》，《申报》1925年12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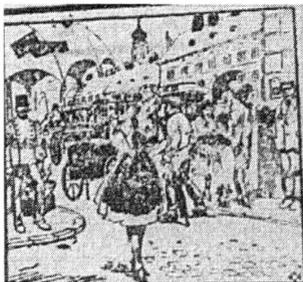
^④ 漱梅：《服装漫谈》，《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⑤ 《人体美》，《妇女时报》，1911年第2号，第7-11页。

^⑥ 《人体美》，《妇女时报》，1911年第2号，第7-11页。

此时的报刊杂志上，经常登载国外时下最流行的服饰，如“美国波司敦城市妇女服装，变化甚速，近来复兴袒背，几将背部全露，衣所蔽者，只十之一耳……，于是彼邦一般闺秀又争效之。”^①国人旅行欧洲时，看到妙龄女郎多穿围裙（连衣裙），这种裙子用“单层红细布为之，形式大小略似中国医院看护妇所围者”。^②作者认为国内女子的服饰呈现出的美感，在西国妙龄女郎的围裙相比之下逊色很多。^③

当时的巴黎时装也被介绍到国内，人们敏锐地发现以往法国巴黎妙龄女子的衣裙颜色向来多娇艳浅嫩，而欧洲战后由于燃料缺乏，深色价廉耐用，颜色变幻愈奇者愈不易得。于是，法国女子在衣服上“或作宽边或作细纹或用缝机，盘出各种花式以增加服饰的美感”。^④这种巴黎女新装在当时非常流行，不过多久便传入国内。^⑤



汉族服饰自古以来崇尚褒衣博带；清代以来，满族“剃发小袖圆领纽扣，所以便躺射行阵”^⑥的服制被汉人接纳。时至今日“西人之衣服，较满洲式尤为便利，故今人多服之”。^⑦国内服饰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从衣服装饰品上的纽扣、花边到裁剪上注重立体美、曲线美。这些细细小小的变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酝酿着 20 年代最为流行的一种改良服饰——旗袍的诞生。

^① 幻梦：《时装之日新月异》，《申报》1920 年 7 月 10 日。

^② 幻梦：《时装之日新月异》，《申报》1920 年 7 月 10 日。

^③ 幻梦：《时装之日新月异》，《申报》1920 年 7 月 10 日。

^④ 《巴黎繁会记》，《申报》1921 年 10 月 18 日。

^⑤ 《巴黎繁会记》，《申报》1921 年 10 月 18 日。

^⑥ 幻梦：《时装之日新月异》，《申报》1920 年 7 月 10 日。

^⑦ 《巴黎繁会记》，《申报》1921 年 10 月 18 日。

^⑧ 心因：《小引》，《申报》1925 年 12 月 21 日。

^⑨ 心因：《小引》，《申报》1925 年 12 月 21 日。

第二节 旗袍的演进

自从北洋政府规定对民间服饰不加限制以来，从服饰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的女子尽情的展示自己的审美情趣，民国初年女子服饰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五四运动时期简单朴素的学生装大行其道，在男女平权思想刺激下开始出现的女子长袍、长衫也成为众多女子服饰样式中的一员。但是初兴的女子袍服是严冷方正的，与男子长衫没什么两样。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女子对西方民主观念的进一步理解以及对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接触，当时女子对服饰的变革无不体现出她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追求。1920年代中期以后，贴身的旗袍受到女子的喜爱，当时的旗袍多选用西式轻软和暖的布料，明艳的颜色也更受青睐。

从长袍马甲到长马甲——女子袍服的最初变化



长袍马甲是满族女子最常见的打扮，辛亥革命以后曾经沉寂一时，二十年代开始又开始出现。^①漫画中使用洋酒和高脚酒杯的女子^②享受着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她的长袍小马甲也是当时非常文明、进步的服饰。当时的女子长袍加马甲看起来与男子长袍非常相似。下面漫画

画中的女子身着长袍，外面罩小马甲，这一漫画中女子的装扮跟同一版面一幅买香烟的广告漫画中男子所穿衣服很像。1924年的夏士莲广告中，这位漂亮的时尚女子也穿着类似的服装。



1923年以后的春秋时节开始流行穿长马甲了，她们将原来的长袍改为无袖的马甲，这是民国女子袍服的最初变化。^③穿时里面要穿一件短袄，^④这种长袍

^①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② 《霍氏补酒广告》，《申报》1923年6月16日。

^③ 《漫画》，《申报》1923年8月7日。

^④ 《漫画》，《申报》1923年8月7日。

^⑤ 《广告》，《申报》1924年4月11日。

^⑥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6页。

马甲一直流行到 1925 年左右。上海是当时公认的服饰时尚中心，其声势远远领先于全国各地并左右着中国时尚的变化。一位叫“新依”的女士，她是当时的大裁缝，她认为“最近上海所流行之装饰品及衣服式样，未久已流行于各省内地”。^①上海作为时尚的中心，“上海妇女之装束，已经趋于欧化”；^②在最近流行服饰的裁剪上面“只于腰际取瘦窄称身”，^③“时尚的长马甲最初就是在上海出现的”。^④不久之后在北京也能看到长马甲的身影了，人们认为长马甲是将“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长”^⑤后做成的，这种新式服装在服饰文化上较为保守的北京还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穿上长马甲之后就像“穿一件大坎肩好像个秃和尚”。^⑥作者把这位着实时髦的北京富家女描述的惟妙惟肖：

前清的衣服改瘦去长，穿一件大坎肩好像个秃头。纽扣上戴鲜花你又没进过女学堂。手绢掖在底襟上，……旗装打扮穿裙子，实在不合样。汗巾搭拉有多长，散着裤腿不把腿带儿绑，穿一双上海坤鞋你愣说改良。^⑦

此时，旧式的袄裙、袄裤也出现了新变化，对女子长袍的演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衣领降级高度，让颈项露出来。领口挖成圆形、鸡心形、金刚钻形”。^⑧这些变化增加了服饰的美感。而传统清式马面裙慢慢简化，摺裱越来越少，乃至消失。^⑨随着 1910 至 1920 年代，在留日学生的影响下“文明新装”异军突起，“文明新装”袖子的新式样，“短露肘或露腕呈喇叭形，袖口一般为 7 寸，被称为‘倒大袖’。”¹¹“倒大袖”虽然引自日本，但是在中国流行了一段时间后被中国服饰文化接纳和认可，它被认为是“20 年代中式女装最显著的特征”。¹²旗袍在改良过程中就吸收了这一因素，20 年代的旗袍一直沿用这种袖形，直至 30 年代才慢慢消失。

长马甲不管从服饰的裁剪上、审美取向上还是服饰的象征意义上都充满了

^①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年，第 11 页。

^② 新依女士述，马二先生记：《上海妇女之新装束谈》，《申报》1924 年 12 月 18 日。

^③ 新依女士述，马二先生记：《上海妇女之新装束谈》，《申报》1924 年 12 月 18 日。

^④ 新依女士述，马二先生记：《上海妇女之新装束谈》，《申报》1924 年 12 月 18 日。

^⑤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2 页。

^⑥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 年，第 241 页。

^⑦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 年，第 241 页。

^⑧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 年，第 241 页。

^⑨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2 页。

^⑩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2 页。

¹¹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1 页。

¹²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24 页。

西化、现代化的气息。旧的服饰消失、新的样式产生，所有的变化都酝酿着近代改良旗袍的诞生。

长马甲与短袄结合——近代改良旗袍的诞生与发展

1926年，长马甲与短袄合二为一，完成了旗袍真正意义上的改良，这时的旗袍的袍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大约在小腿肚的地方，袍摆和袖边镶有花边（见下图左^①），但是繁缛之风日减，“‘襴干’和阔滚条被视为过时的象征。”^②第二年，旗袍的繁琐花边隐退，长度稍稍缩短，到膝盖以下，^③袖形仍保留了传统的宽袖。（见下图中^④）“1928年受欧美短裙风的影响，旗袍长度缩短至膝盖处，袖口宽向窄收缩”。^⑤之后，旗袍的摆线又上升至膝盖以上，有的袖子借鉴了西装的样式，穿着更加的合体、舒适。（见下图右^⑥）不过，一年后旗袍的摆线又忽地落下，隐退多年的花边又卷土重来，无论是单色的、杂色的、花的、格子的统统都在边上镶上了滚边。



正当人们以为旗袍的样式再无变化时，长袄旗袍从交际场迅速进入民间，那些曾经时髦的短袄旗袍又被束之高阁。一年的时间，袄越开越高，几近臀下，同时，为了更好的衬托女性的曲线，其腰身也越来越窄，（见下图漫画^⑦）到了



1935年流行不到两年的长袄旗袍又让给了短袄，其长度转移到裙摆。“扫地旗袍”有如一夜春风吹过，千万人效仿。^⑧

旗袍从2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到30年代基本固定下来，与其说是旗袍的演变史，不如说是旗

^①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② 包铭新主编：《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③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66-67页。

^④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⑤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69-70页。

^⑥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⑦ 朱小汀作：《漫画：旗袍的三个FORM》，《实报半月刊》，1937年2月，第10卷，第31页。

^⑧ 白云：《中国老旗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袍被女子穿成时尚的历史。女子服饰的每一次变革，旗袍的每一个细节变化，无不是女子对服饰无止境探索的结果。十多年间旗袍的摆边、袖边、领边等一直在变，胸腰臀曲线越趋明晰，裁剪上注重贴身合体，西式审美对旗袍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正是这种“变”才使得旗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独领风骚持久不衰。

时人对旗袍的言说

1925年“旗袍”这样的字眼开始出现在报端，^①对旗袍的讨论大致包括旗袍的便利之处、身体对旗袍的感受以及旗袍变化的主要原因等方面。人们认为旗袍的好处很多：显身形、富有美感、很有韵致；与传统服饰相比对身体的约束减少；而且行走便利；此外她们提到冬日穿长袍比短袄保暖。而旗袍服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女子的好奇心。

有一女子认为内衣之外“冬天加新式旗袍最便当”，因为“旗袍很有韵致，腰间也可以收小，愿意露颈的，不妨开大领”。^②其次，冬天穿旗袍“比两截的衣服温暖得多”而且女子穿“轻柔软薄”的最美，所以应该穿长衣。总之，旗袍为一件制的衣服，穿着方便；冬天穿旗袍不透风还保暖；而且旗袍为长衣，显身型美观大方。

内衣之外，冬天加新式旗袍最便当（张先生不甚赞成的旗袍，其实旗袍不过是一个名称，与旗人穿的长袍并不同）旗袍很有韵致，腰间也可以收小（注意：不可太紧，紧则不伸），愿意露颈的，不妨开大领，或仿古装，是领都行，最要紧的就依体格的肥瘦长短为准，在襟袖腰身上加以考究……

③

还有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民国前后女子服饰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衣服对身体的束缚减小了。“从前的衣服，长而且小，袖口不及四寸，领头倒有二寸多高，长虽未能及膝，但足有二尺多。”^④而现在的衣服，“袖口有八九寸阔，长不到一尺八寸”。其次，一件制的旗袍保暖，冬天再也不用受冻了。再则，旗袍美观大方，一件制的长衣穿着很显身形。作者认为，女界服饰较之于男子的变化快、进步多，主要是因为“女界的好奇心比男子大”^⑤，服饰的变迁体现

^①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②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③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④ 徐郁文女士：《衣服的进步》，《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⑤ 徐郁文女士：《衣服的进步》，《申报》1925年12月21日。

了女子的心理诉求。

有人认为旗袍是欧美的服饰，因为旗袍体现了欧美服饰的所有特点：“短小轻便，便于做事；式样新颖，有活泼的精神；击破封建制度思想，能充分表现人体美——即肉体美。”^①而旗袍除了体现以上三点西方服饰的共有特征外，旗袍“布料不多；制造简便；省去一条裙子。”认为旗袍的出现和演变是中国妇女服饰史上的很大的进步。^②

另外作者提到，“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张先生不甚赞成旗袍”，^③因为他是旗制。而有人则认为旗袍不过是一个名称，与旗人穿的长袍并不同”。^④当时很多人不满意女子穿这种跟满人有很大关系的旗袍，主张应与外人一样穿西装，才算合理。还命令自己的太太、女儿不许穿旗袍，因为长袍是旗制，而且不合现代生活方式，令人丧失了活泼的天性”。^⑤“旗袍”，这个新名词是旗装、女子袍服、长袍、长衫等各色服装的综合体。

从整体上看，人们的审美观已经西化，不追求宽博稳重更注重显身形有韵致；不看重繁复的装饰更加在意行走便利，方便做事。还有人提出穿了旗袍省去了一条裙子（可能指传统的“上衣下裳”中的“裳”），经济便利。有人对旗袍这个名字很不满意，认为是恢复到满族时期的服饰，所以不应该叫旗袍；更有甚者拒绝穿旗袍，而主张穿西式服装。不同的人对旗袍有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旗袍就是在不同的争论中、不同人不同认知的交流过程中，旗袍这个概念形成了。

民国时期女子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多，女子到社会上工作、学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正因为此，在旗袍的流行过程中也有多股力量参与其中，包括



电影女演员、富贵名媛、政治人物、舞女、女歌手、女学生、评弹女、妓女等等，她们穿什么样的旗袍、以及在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旗袍，每一个细节和过程都在对旗袍的演变过程施加作用。不过有一个群体在旗袍的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尤其大，以至于人们在

^① 伊凡：《评长旗袍》，《循环》，1931年1月，第6期，第107页。

^② 伊凡：《评长旗袍》，《循环》，1931年1月，第6期，第107页。

^③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④ 明晖：《谈谈新装束》，《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⑤ 常士：《王俊反对穿旗袍》，《周播》，1946年3月，第35页。

20年代中后期称旗袍为电影服饰。(插图为26年风靡一时的电影《一串珍珠》的剧照^①)

有人说“上海的衣服近来也真会变花样，从前两三年一变，现在两三个月就变了，花样翻新的创作者，现在还加入电影明星一班人，差不多新式时装，都是电影明星翻出来的”，^②1925年中国电影开始有了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影女演员，她们在成为电影明星的同时，也成为主导服饰时尚潮流的明星。“就剪发及旗袍而论，在今春已呈弩末之势，而一经黎明晖采取，即又复辟起来，年轻的娇娃多变了短发齐眉的刘海小姐，短小的袄子多换了长袍了。”^③旗袍在经电影演员黎明晖在电影中穿过以后，马上变成了最流行最时尚的衣装，短小的袄子也都被搁置一边了，而换上了明星们穿的旗袍。

更有人直言不讳的说“现在的服饰，可称电影服饰，因为现下流行的服饰，大多是一般电影女演员造成的”。^④因为这些女演员在扮演的时候不能长着一色的衣服，“必须时常换新，衣服的样式，必须开未尝有，并须调和颜色的美观，求观众的赞美，那好学时髦的妇女，不知觉的随着他们变动了”。^⑤

小结：

清代旗女宽博的袍服，在清灭亡之后依旧被满族妇女沿袭继承，后来也被汉族妇女接受。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激起了女性要求解放、男女平权的思想，她们有意无意的扬弃专属女性的装扮，刻意模仿男子服饰，以期在自己可以操控的服饰领域达到平权，实践着她们最朴素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以后袍服愈加受到女子欢迎。民国时期西方服饰在裁剪上注重立体美、曲线美的审美观对国内服饰形成巨大影响。20年代初流行的宽阔袍服渐渐被注重腰身与线条的旗袍取代，此时的旗袍承继了旗女袍服“一件制”“服饰的基本理念，加上先进女子对男子长衫、长袍的刻意模仿，再经过西方新型审美的裁剪，到了20年代中期近代旗袍基本成型了。旗袍也被各色时髦女子喜爱，包括一些政治精英，她们穿着旗袍出入各种公共社交场合；电影女演员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旗袍的流行。直到1929年被南京国民政府纳入服饰制度，定位国服，

^① 《良友》第2期，1926年3月15日出版，第9页。

^② 人王：《真善美的女性衣服》，《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③ 人王：《真善美的女性衣服》，《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④ 英章：《妇女服饰的派别》，《申报》1925年12月21日。

^⑤ 英章：《妇女服饰的派别》，《申报》1925年12月21日。

使得旗袍不仅在民间有了群众基础，在中华服饰制度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被纳入服制、定为国服的旗袍一直到三、四十年代都是女子服饰的主角。

结 论

纵观民国前 20 年女子服饰的变迁,可以看到服饰发展的主要脉络是从传统到现代转换,以及从借鉴到再生的重塑。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在制定服饰制度时表达了向西方学习、与世界大同的态度。社会风气也迎合了这种要求。尽管国家制定服饰制度时规定“女子礼服无多变更”,只要延续前朝服制则可,但对常服不加限制。因此,女子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下风尚不停地更换着各式新式服装:西式裙纱、中式紧窄衣裤、旗装、男子西服、戎装,可谓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中西杂糅、古今并存的服饰奇观,与政府制定的礼服制度中单一的礼服样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每一次服饰的变化、每一种服装的流行无不体现了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时尚与现代的诉求。此时女子服饰上的“崇洋”心理,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向往;流行的紧窄衣裤也展现了人们积极摆脱传统服饰形制上厚重臃肿,面料上质感粗糙、色泽单调的传统老旧格调,期望在外表上追求简明、整洁,色彩斑斓的崭新精神面貌;民国初年“女子服男子服”更是先进女性的刻意追求,是辛亥革命以后女性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在服饰上的体现。

五四运动时期简洁朴素的学生服是当时广受欢迎的服饰。就女子服饰而言,“文明新装”是五四时期的潮流服饰。“文明新装”属于套裙,区别于中国传统服饰“上衣下裳”中的“裳”;“裳”属于罩裙,即裙子内穿裤子,而套裙下面则不穿裤子。从“上衣下裳”到“文明新装”,从罩裙到套裙,中国女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自从有了“文明新装”,传统女子服饰不能暴露身体的习俗被打破了。五四运动时期在自由、平等、男女平权思想的刺激下出现的女子长袍、长衫开始成为当时女子服饰的一部分。

最初的服制是用来区分上下等级尊卑的,民国时期的服制则是为了与满清划清界限,向西方学习、与世界大同。民国时期的时尚是政治的时尚,此时的时尚与服制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没有北洋政府趋向西化、民主化的服制,不可能出现民国初年女子服饰的繁盛景象;没有五四运动以来女子对民主、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以及对西方审美的认同,旗袍不会自动贴上男女平权的标签,

南京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凭空将缘于满族袍服的旗袍纳入服制^①，旗袍被定为国服后又促进它的进一步流行和普及。

清代的汉族女子不得同男子、满族女子一样穿“一件制”长袍和马褂，这种赤裸裸的歧视为后来渴求男女平等的先进女性穿长袍、长衫并称其为旗袍埋下了伏笔。五四运动以来，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激起了女性要求解放、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服饰上，她们有意无意的扬弃专属女性的装扮，刻意模仿男子的长袍、长衫，以期在自己可以操控的服饰领域达到男女平权，实践着她们最朴素的平权思想，女子袍服随之兴起。民国时期西方服饰在裁剪上注重立体美、曲线美对国内服饰形成巨大影响，中国女子也慢慢接受了这种新型的审美观。旗袍在 1920 年代以来的演进中慢慢的开始注重腰身、胸线与臀线，经过西方新型审美的裁剪，到了 1920 年代末期近代旗袍成型了。旗袍受到各个领域时髦女郎的追捧，也被一些电影明星、政治精英喜爱，她们穿着旗袍出入各种公共社交场合。直到 1929 年被南京国民政府纳入服饰制度，定位国服，使得旗袍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参考资料

1、档案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Q5-3-858 中央发布服制法令，全宗号 C523。

2、报刊杂志：

《申报》，1911-1929 年（共 150 本），上海：上海书店 1983 年出版。

《大公报》，1912-1929 年影印本。

《新闻报》，1912-1929 年。

《民立报》，1911-1913 年。

《民国日报》，1916-1929 年，上海版、汉口版影印本。

《晨报》，1912-1929 年影印本。

《良友》，1926-1929 年，我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份综合性新闻画报。

《女子世界》，1904-1907 年，重要的晚清妇女杂志。

《妇女时报》，1911-1917 年，第一份商办女性报刊。

《妇女杂志》，1915-1931 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5 册，人民出版社，1982-1987 年。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 1-3 集，三联书店，1979 年。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 1-4 册，三联书店，1979 年。

3、通史：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美]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1 年。

[美]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9-15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4、著作：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 4 月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年。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黄能馥著：《中国服饰通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

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

华梅：《中国服饰》，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4年。

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白云：《中国老旗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包铭新：《中国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

袁杰英：《中国旗袍》，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

郑嵘、张浩：《旗袍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

于君：《女性与旗袍》，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

于金兰：《中华旗袍》，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李霞芳：《时尚与典雅旗袍》，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谭依山：《中华旗袍》，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

唐光艳著：《旗袍》，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年。

江南，谈雅丽编著：《符号中国，旗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华书局1961年。

张爱玲：《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张爱玲：《流言》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金天翻：《女界钟》，上海：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重印。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84年3月第一版，本书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

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叶汉明：《主题的追寻——中国妇女生活史研究析论》，香港：香港教育学院图书公司1999年。

中央研究院近现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近代中国

妇女史研究》1-13期。

王政, 陈雁主编, 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编:《中国百年女权思潮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王政:《界越: 跨文化女权实践》,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

刘慧英编著:《遭遇解放: 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

张莹:《社会性别视角应用研究》,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

【美】伊沛霞著, 胡志宏译:《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美】高彦颐著, 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美】曼素恩著, 定宜庄、颜宜葳译:《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美】贺萧著, 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

【加】宝森著, 胡玉坤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Jin Jiang, *Women Playing Men: Yue Opera and Social Change in Twenti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3).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主要参考论文:

夏目晶子: 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服饰文化变迁与社会思想观念, 天津: 南开大学, 2009年5月。

【日】周星: 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 载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

学会 2004 年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姜进：女性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文汇报·学林版》，2004 年 12 月 26 日。

姜进：女性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导刊》，2005 年，第 10 期。

游鉴明：是补充历史抑或改写历史？——近廿五年来台湾地区的近代中国与台湾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13 卷，2005 年。

叶汉明：妇女、性别及其它：近廿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及其发展前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13 卷，2005 年。

后 记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和学术修养以及文字功底都有待继续学习和改进，此外由于参加 ECNU-ENS 中法联合培养项目，学习法语的占去很多时间，所以查资料以及写作的时间都不是很充足。这篇论文还存在诸多不妥之处，跟姜老师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会继续改进。虽然只是一篇硕士论文，但是我真实的感受到学术不易，呕心沥血！同时我也从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快乐。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在我 25 年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了难以舍去的记忆。这个美丽并且现代的城市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见识；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周身的济济人才激励我不断前行，历史系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受教颇深。三年中我在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导师姜进教授是一个良师益友，她对学术要求严谨，而且鼓励我们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三年中让我受教良多。从研一参加《申报》《新闻报》资料汇编，我接受了最基础也是历史系学术最重要的史料收集训练，研二参加了行走上海的计划，虽然由于课业繁重，最后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但是其中我受益匪浅。感谢刘昶老师、李世众老师、杨奎松老师、许纪霖老师、韩刚老师，感谢他们启发我的思维，感谢他们唤起我学习的动力，感谢他们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万笑男师姐，给我的论文做一再的修改；感谢同门李斌、赵莹莹、谭冠华、王楚楚、王书吟、杨明睿等给我的论文提供的帮助；感谢同窗挚友董涛帮我做文字编辑；感谢家人的关怀和支持！

原海晓

2011 年 5 月 22 日